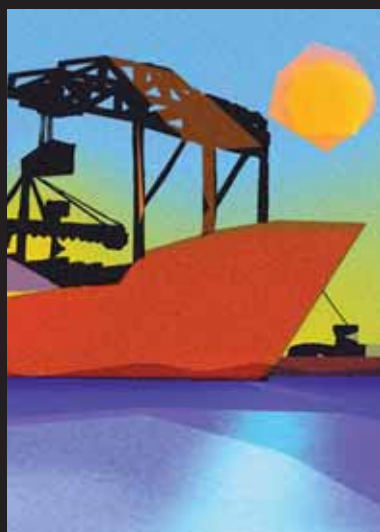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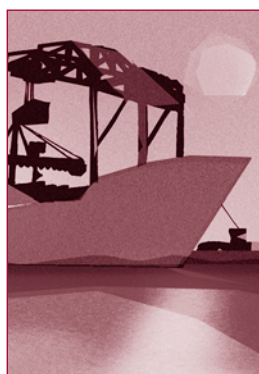


# 将穷国纳入 世界贸易体系



# 将穷国纳入 世界贸易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

丛书编辑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Asimina Caminis

封面设计和排版  
基金组织多媒体服务处  
Massoud Etemadi和Michelle Martin

ISBN 1-58906-537-9  
ISSN 1020-8399

订购基金组织出版物，请联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 623-7430 传真：(202) 623-7201

电子信箱：publications@imf.org

互联网址：<http://www.imf.org/pubs>

## 前言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扩大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直到1986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开始前，多边贸易协定还主要限于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尽管显著受益于全球贸易增长，但很少积极参与谈判过程。

1994年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当时，历史上最全面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并且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开放贸易的义务，作为更全面地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交换条件，而较穷的发展中国家同意在一定期限内实行主要贸易国家实行的非歧视性规则。然而，尚有若干重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乌拉圭回合未竟事项的贸易谈判于2001年在卡塔尔发起，即所谓的多哈回合。由于该回合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称多哈发展议程。谈判涉及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呼吁加强贸易规则和特别条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落实乌拉圭回合的一些承诺事项。但是参加谈判的国家难以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取消农业保护问题上。农业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议题，超过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尽管后两个领域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很重要。

工业化国家间达成互惠协议的空间正在减少。世界贸易组织关注的重点正不断转向工业化国家与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其相对封闭的服务、资本和制造业市场作为要价筹码，以换取更全面地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农产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市场。

对那些较小和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在优惠贸易安排下，很多国家目前实际上可以没有阻拦地进入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担心调整成本、粮食安全以及因其他国家竞争而失去出口市场。它们还担心贸易规则越来越复杂，可能会加大执行成本，从而影响其落实发展政策的能力。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一步开放贸易有很大的未发掘潜力。随着多边自由化持续发展，所有国家将受益于全球经济更加快速的生长。每个国家自身的贸易改革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一体化程度长期内带来的机会远远超过短期内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高估。在国际机构和捐资国的援助下，执行和调整问题应该是可控的。

近期研究对贸易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特别是贸易、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以及低收入国家开放贸易体制后可能产生的成本与收益。本期《经济问题》对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本文依据的报告将在文中引用，并可以在基金组织网站上免费得到。

## 将穷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自**乌拉圭回合在1994年结束谈判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出口市场准入和自身的贸易政策改革，比援助的增加更能带来好处。一系列证据（跨国和固定样本数据增长回归、行业和企业层面研究以及案例分析）表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经济增长则是减贫的必要条件。

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在亚洲，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与以往穷国的快速增长联系在一起。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国家一般比那些采取内向型政策的国家增长要快，因为内向型政策阻碍了一体化并抑制竞争。这些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后，贫穷现象急剧减少。



### 贸易、增长和减贫<sup>1</sup>

经济学家长期观察后发现，采用相同体制、货币或政策，同时又相对自由进入对方市场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内存在收入趋同的倾向。例如，1960年到1982年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地区以及在经合组织内部，贫穷地区或国家的收入每年以2%的速度向较富裕的地区或国家靠拢。实际上，较穷国家和地区一般比它

1. 本部分采用了Andrew Berg和Anne Krueger的观点，2003年，“贸易、增长和贫穷：有关调查”，《2003年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会：新的改革议程》，Boris Pleskovic和Nicholas Stern主编（纽约和华盛顿：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世界银行）。工作文章版本可从基金组织网站上获取，[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3/wp0330.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3/wp0330.pdf)。

们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富裕邻国增长更快。

似乎有道理的是，贸易开放，即本国人与外国人在没有人为限制（如关税与配额）情况下开展自由贸易，通过促进专业化和竞争以及知识转移，在收入趋同过程中起了作用。

但是，同时还发现，那些广泛开展贸易的国家一般都有良好的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这就产生了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议。与贸易有关的良好体制与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否更为重要？是贸易促进增长还是增长促进贸易？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还是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呢？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些跨国以及固定样本数据回归试图分解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向，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与更高经济增长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论贸易开放度是按一国的贸易政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是按一种结果（出口加进口与GDP的比率）来衡量，此结论都能够成立。当使用购买力平价GDP来代替绝对GDP时，相关性更为明显，因为购买力平价消除了国家之间非贸易品价格差异的影响。

然而，两种开放度指标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对单个贸易限制政策的分析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低的平均关税可能掩盖了针对某些关键产品的限制程度。非关税壁垒尤其难以测量，它们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歧视性的汇率政策向出口商提供比进口商更高的汇率，又如海关清关延误引起的不确定性，以及临时保护措施（威胁在一国出现高的进口渗透率时，将根据反倾销或保障条款，限制某类进口）。动植物检疫以及技术标准也可达到保护主义的目的。这些措施的影响很难量化。

遗憾的是，第二种衡量开放度的指标，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也同样不完美。它不仅反映贸易开放度，还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伙伴的距离等地理因素以及资源禀赋。

但是，案例研究支持贸易自由化提高增长率的观点。尽管开

放贸易并不能保证加快经济增长，但过去20年来所有经济起飞国家都将贸易开放列入一揽子改革方案。1978年的两项重要研究分析了实行开放国家从进口替代向外向型贸易政策（即没有不利于出口的政策偏向）转变的发展阶段。<sup>2</sup> 这些研究描述了各种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扭曲如何在经济中以基本上未被预料和不理想的方式出现，并描述了进口和经济增长如何对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以及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反应。世界银行对19个国家在1946年到1986年间的36个贸易自由化阶段的设计、执行和结果的分析表明，强劲和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导致出口和实际GDP快速增长。<sup>3</sup>

199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sup>4</sup>发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1960年最穷的国家在1960年到1985年之间的发展也最慢，但是在开放经济中，最初的低水平与后来较慢的经济增长并不相关。在封闭经济体中，最初的低收入降低了来自规模经济的潜在收益，但是，贸易开放通过扩大该国的市场准入，克服了这一难题。

更近期的微观经济研究指出了开放度提高生产率的几个渠道，包括机器和设备进口（一般伴随着专业知识的转让）。其他研究表明，进口竞争降低毛利和增加周转量，促进了创新。

贸易是对其他改革的补充。许多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证据受到的一个批评是：开放度的影响不能脱离良好的体制以及同时实施的其他改革措施。例如，在案例分析和事件前后比较中，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很难与宏观经济稳定、国内价格放开、汇率体

2. Jagdish N. Bhagwati, 1978年, “汇率管制体系的结构与后果”, 第11卷, 《外贸体制与经济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Ballinger); 以及Anne O. Krueger, 1978年, “自由化尝试与后果”, 第10卷, 《外贸体制与经济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Ballinger)。

3. Armeane M. Choksi, Demetris Papageorgiou和Michael Michaely, 1991年, “贸易自由化”, 第7卷,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牛津: Blackwell)。

4. Alberto F. Ades和Edward L. Glaeser, 1999年, “关于增长、收益递增以及市场程度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第114卷(8月), 第1025-45页。



制和汇率本身的变化、资本账户开放、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许多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区分开来。

在解释贸易改革与其他政策不同作用时，重要的是区分前提、可取的互补和有益的改革溢出效应。开放贸易产生好的效果几乎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并且有很多理由说明贸易开放可能促进其他改革。开放为各种政策对生产率和增长产生影响提供了很强的反馈渠道。例如，与国外企业竞争能够暴露低效率的产业政策。开放增加了互补改革的边际产出，因为基础设施、电话、道路和港口条件的改善使出口部门表现更好，同时也提高了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企业的生产率。而且，贸易自由化还可能通过取得公众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改变政治改革动态。

**增长减少贫困。**从1978年到1998年，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的比例从38%显著下降到19%。由于人口增长，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下降的幅度较小，但也不算太少：从14亿人降到10亿人。这种下降被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而不是收入分配变化所致。

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为这种发现提供了支持。1980年到1992年，中国人均收入年增长3.6%，但收入差异显著增加（中国基尼系数从0.32增至0.38）。但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少了2.5亿，因为收入快速增长的效应超过了收入差异增加的效应。收入差异将需要比其实际增速快两倍，才能抵消强劲增长的影响。同样，印度贫困状况也显著改善，贫困人口从1987/88年占总人口的35%下降到1999/2000年的23%，如果经济增长与收入完全成比例，贫困人口比例还会在90年代下降到21%；然而，与中国一样，印度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也伴随着收入差异的上升。

关于贸易带来的增长使穷人相比其他社会团体受益多还是少的问题，从单个开放时期的无数研究中无法得出清晰的模式。这不奇怪：贸易自由化能够改变经济的相对价格和激励机制。但是，还是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贸易自由化一般会减少垄断租金以及与官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还会增加低技

术工人的相对工资；贫穷的消费者受益于贸易自由化通常带来的低价格；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贫困人口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通常对穷人的影响最大（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但是，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整体好处大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必要回忆一下，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此很少有人说因为技术最初给每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平均，而希望阻止技术进步。



## 发展中国家担心的问题

尽管有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可能对最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好处，但在很多这些国家被说服完全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前，需要解决一些它们担心的问题。除了担心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受损外，它们还担心贸易自由化对国际收支、财政账户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如果逐渐失去优惠条件，从而与其他更低成本的出口商竞争，出口收益可能下降；取消进口关税后政府收入受损失；取消农业补贴后进口食品的世界价格提高。

优惠逐渐流失。<sup>5</sup> 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富裕国家的出口享受非常低关税或零关税的贸易优惠。普遍优惠待遇为144个国家和地区的很多产品进入经合组织国家市场提供优惠关税。此外，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集团进入欧盟市场享受更多优惠，而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除了糖、香蕉和大米外），根据“除武器以外所有事物的倡议”，几乎以零关税或零配额的待遇进入欧盟市场；并在其他类似安排下，优惠进入其他经合组织市场。根据“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非洲国家享受对美国的出口优惠。随着

5. 本部分采用了Katerina Alexandraki 和 Hans Peter Lankes的观点，2004年，“优惠条件逐渐流失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基金组织工作文章04/169，[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169.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169.pdf)。

经合组织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条款，降低来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口关税，这些贸易优惠所带来的价值将逐渐流失，尽管这可能被市场规模扩大以及更高的世界价格所部分抵消。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其出口会因一些关键市场上的竞争加剧而失去优势，因此抵制世界贸易组织普遍降低关税和配额的努力，并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引起冲突。

预计经合组织以外国家给予的贸易优惠流失的影响会较小和更加渐进。随着区域内国家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框架下降低共同对外关税，提供低（或零）贸易壁垒的区域贸易协议的优势逐渐减少，但区域内贸易实际只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出口的很小一部分（东南亚国家除外）。而且，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还享受“特别和区别待遇”，并可能在任何多边协议下争取获得更加渐进地降低贸易壁垒的条件。

即使采用相对保守的假设，在一个现实的贸易自由化情景下，潜在冲击的总体幅度是很小的：根据Alexandrek和Lankes的研究结果，取决于出口需求的弹性，为76个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总额的0.5%到1.2%。按照多哈回合或其他贸易改革制定的自由化时间表，该效果还可能分布在较长时间内。这将有利于有关国家的调整计划。

然而，对少数国家来说，如果其出口行业未多元化，严重依赖欧盟和美国市场，并且宏观经济框架脆弱（如小岛国），冲击可能很显著。然而，这种潜在的出口损失应该放在一国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框架下考虑，包括其他经常账户收入来源，如旅游业。

最可能受到优惠条件逐渐流失影响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是出口糖和香蕉的国家，较低程度还有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国家。对那些优惠价差（某种产品最惠国关税与优惠关税的差额）总值超过出口总值5%的国家，糖和香蕉占目前优惠价差的四分之三。

这意味着，政策讨论以及对面临调整成本国家的任何支持，都应该以这三类产品及依赖其的国家为目标。另一个含义是，对于优惠条件流失而言，经合组织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之外进行的

糖类和香蕉政策改革的影响要比多哈回合更大。

食品进口价格提高。<sup>6</sup> 世界农产品市场因很多工业化国家为保护其农业生产商采取的关税和补贴（包括出口补贴）措施而受到极大扭曲。这些政策给经合组织国家带来的代价非常大，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大部分农业补贴的代价落在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身上。但是，通过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农业补贴还使得低收入国家的食品生产与进口相比缺乏竞争力。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呼吁经合组织国家取消引起贸易扭曲的农业补贴。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国际领导人呼吁富国降低（并最终取消）农产品补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即经合组织国家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毫无疑问，取消农业补贴将提高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实际收入。但是，经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这些补贴压低了一些农产品的世界价格，实际上有利于一些穷的发展中国家。结果，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实际上从这些补贴中受益，如果一个国家是这些商品的净进口国，该国作为一个整体受益。取消这些补贴则会对其造成损失。谷类和奶制品净进口国（中东和非洲）可能尤其会受到自由化的严重打击。但是，Tokarick的研究指出，对于79个国家中的大部分，涨价幅度很小，低于受影响进口总值的2%。

然而，对消费者好的东西却伤害了国内生产者，使得后者竞争不过低价格的进口产品。由于贫困状态集中在农村地区，农产品低价格尤其对穷人造成伤害。那些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伤害，因为其价格被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补贴人为地压低。如果取消这些补贴，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净出口收入。

6. 本部分采用了Stephen Tokarick, 2003年的观点, “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衡量农产品贸易扭曲的影响”, 基金组织工作文章03/110,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3/wp03110.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3/wp03110.pdf)。

税收收入流失。<sup>7</sup> 过去二十年来，随着各国削减关税水平，贸易税收入的重要性下降，但仍然是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一项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一般占总税收收入的五分之一，常常更多。如果贸易自由化减少了关税收入，这些国家可能需要开发其他政府融资来源。

基金组织对125个国家从1975年到2000年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影响的研究部分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和规模。过去二十年中，贸易自由化趋势引起贸易关税收入的损失约占低收入国家GDP的2.5%，或约占其税收总量的六分之一，而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税下降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仍然很重要。尽管中高收入国家国内税收基本替代了失去的贸易税收入，低收入国家国内税收占GDP的整体比重在这一时期却没有增加。

这些结果当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实行减少税收收入的贸易改革是错误的，但却强烈地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加强国内税制之间的协调不够，应对税收问题引起比目前更多的关注。

在削减关税并在随后二十年中损失关税来源的低收入国家中，几乎有一半国家从其他收入来源中弥补了不到所损失收入的70%。但一些低收入国家，包括马拉维、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却成功地弥补了损失的贸易税收入。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很大一部分恢复收入来自加强国内消费税——特种消费税以及尤其是增值税。这些国家征收的所得税收入的表现也强于那些未能弥补关税损失的低收入国家。在很多情况下，税收恢复属于广义改革措施的一部分。例如，塞内加尔1999-2000年的基金组织援助项目包括对该国关税结构进行大的简化，同时将多种增值税率统一为单一税率。

7. 本部分根据Thomas Baunsgaard 和 Michael Keen, 2005年的文章, “税收收入和(或?)贸易自由化”, 基金组织工作文章05/112,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5/wp05112.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5/wp05112.pdf); 以及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 2005年, “处理贸易改革的税收影响”,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021505.htm](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021505.htm)。

这些成功的故事表明，困难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改革国内税制的强烈承诺。它们的经验提供了有用的教训。如果自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进口，本身就会限制税收损失，甚至是增加净收入，特别是取消非关税壁垒后，会增加收入。但是随着关税改革的深化，税收恢复还需要未来几年中集中和持续的努力，来拓展税基，取消税收豁免，简化税率结构，和改善税收征管。通过特种消费税，特别是通过一个简易、广泛的增值税来强化国内消费税制，在此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并且，改善所得税征管也能极大促进税收恢复。



### 使自由化道路更为平坦<sup>8</sup>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内会受益于本身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但一些国家可能在初期产生调整成本。它们还可能在履行一些义务上面临困难，例如建立监督和确立保护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体制；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如对出口水果和蔬菜进行消毒；产品接受国际标准编码认证；以及海关程序的现代化。而开放跨境金融服务市场可能会考验其国内监管能力。

富裕的贸易伙伴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满足其中一些繁重的义务，或者减轻这些义务，同时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捐款国可以提供“贸易援助”，即能力建设、机构改革方面的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减轻调整成本。

8. 本部分采用了Aaditya Mattoo和Arvind Subramanian（2004年）及其他人的观点，“世界贸易组织和最贫穷国家：最真实的事实”，基金组织工作文章04/81，[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81.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81.pdf)；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与检查部，2004年，“基金组织对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收支调整的支持”，[www.imf.org/external/np/pdr/tim/2004/eng/022704.htm](http://www.imf.org/external/np/pdr/tim/2004/eng/022704.htm)；以及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工作人员，2005年，“多哈发展议程与贸易援助”，[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091905.htm](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091905.htm)。

技术援助。2004年8月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呼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为促进贸易发展提供技术援助。基金组织为海关管理现代化以及关税改革提供援助。基金组织在海关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具有战略性质，目的在于提供改革和持续监督的整体框架，其他捐款国则在具体问题上提供支持。贸易政策方面的技术援助通常着眼于更广泛的税收问题，而不仅仅是关税问题，以帮助有关国家加强国内税收征管，弥补因关税下降引起的贸易税收损失。在近年来已完成工作的基础上，基金组织正在分析多哈回合各种不同情景下穷国降低关税的财政影响，目的是尽早和以积极的方式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

在其他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基金组织参加了促进贸易体制改革的协同行动，作为减贫战略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技援以及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该议程的核心是基金组织参与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与贸易有关援助的综合框架，这是6家机构（基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其中世界贸易组织担任主席）的一项协同行动，而且有双边捐款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加。综合框架协调发展中国家贸易一体化的论断性研究（见下页专栏），经常是在世界银行的领导下，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参加。

该项研究找出政策和援助的重点领域（“行动矩阵”），在有关国家包括政府、私人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研讨会上进行审查，目的是将其纳入国际发展和减贫战略中来。适当时，向捐款国展示行动矩阵以募集资金，但是综合框架本身也可以为需要快速跟进的能力建设项目提供小额融资。

贸易一体化机制。2004年，基金组织引入贸易一体化机制，帮助那些因为其他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例如贸易优惠逐渐流失，或者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协定配额在2005年到期，出口收入临时下降的国家。如果工业化国家减少补贴使食品进口价格上涨，使基金组织成员国遭受国际收支问题，也可以在贸易一体化机制项下获得资金援助。孟加拉国和多米尼



## 典型的贸易制约因素

贸易一体化的诊断性研究（DTIS）已经发现了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扩展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制约因素。因为汇率高估，运输、电力和用水成本高，或者因为道路和港口设施缺乏，以及低效的通关手续阻碍了清关程序，可能使一国出口缺乏竞争力。由于获得融资能力不足或者利率高，生产商可能不会增加新的出口或为扩大供应进行投资。其他制约贸易扩张的国内因素包括外汇管制，进口附加费和进口税收，某些类商品的出口配额，向国内汇款要求，关税豁免，关税离散，对中间产品实行高关税，体制和治理薄弱，如海关管理的腐败现象、港口延误、法律和司法框架不透明或者不足、以及繁琐的海关和税收法规。

外部制约因素包括经合组织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实行的高关税和贸易优惠条件的逐渐流失。实证研究表明，关税的负面影响大于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可能对那些目前竞争不过低成本生产商（如中国）的国家造成伤害。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履行原产地原则和工业化国家制定的动植物检疫标准上面临困难。

例如，柬埔寨的贸易一体化诊断性研究发现，海关手续方面存在的缺陷是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柬埔寨的减贫战略报告（低收入国家为获得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债务减免资格必须完成的一份文件）也包括了减少清关时间和成本的措施。柬埔寨当局承诺简化关税体制，与邻国协调关税和贸易促进程序，并简化边境检查的管理责任。为使海关人员更加负责任，柬埔寨正在进行工资和就业改革，并加强反腐败立法和行为操守。柬埔寨还对出口实行多元化，并通过提供小额融资、培训项目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建立和发展新的出口行业。

所有被研究国家都需要更多地分析贸易发展和自由化可能对贫困状况产生的影响。它们还需要建立保障体制。例如，柬埔寨将制定逐渐分阶段降低稻米进口关税的计划，以最大程度减少生产商的损失。

加共和国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在该机制下获得资金援助。现有的基金组织其他贷款机制也能提供与贸易有关的资金援助。

贸易促进倡议。在该倡议下，世界银行增加了分析工作和贷



款规模，以协助有关国家利用贸易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将对港口、道路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以及海关程序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体制改革提供新的贷款。世界银行支持有关国家增加其国际竞争力的努力，如重新培训工人，和支付补贴以协助他们在转向出口导向型活动时保持收入水平。世界银行还建立了一个运输和贸易的全球贸易促进伙伴关系。

扩大贸易援助。2005年，代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员国的咨询机构发展委员会同意增加对穷国援助，以克服阻碍穷国从贸易开放受益的基础设施及其他供应制约因素，并降低和管理调整成本。

建议之一是加强综合框架，包括提供可预测的、多年度的约2-4亿美元融资，初始时期为5年。建议之二是检查现有解决地区和跨国贸易援助机制是否足够。建议之三是让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提供分析、建议，并在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对有调整需要的国家做出坚实的援助承诺。由捐款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就加强综合框架的建议进行审查，该工作组将在2006年4月提出体制和治理改革建议。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香港部长级会议建立了一个工作项目，旨在确定哪种贸易援助方法“可操作”，以及找到确保增加融资水平的机制。



## 为什么多边贸易自由化很重要？

贸易是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果取得成功，将是促进穷国发展的有力工具，为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机会。

富国必须通过消除贸易障碍，以及向那些不论是源于短期调整成本、供应面制约还是其他因素，而在完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有困难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从而对促进自由贸易发挥

自身的作用。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降低不仅影响其自身民众，也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而最贫穷的国家，即使它们获得了更多的贸易援助，并赢得了实施一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更多时间，也都必须改革贸易体制，并改进治理和体制，以收获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在捐款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下，这些国家必须将贸易政策改革纳入国家发展与减贫战略中。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成功的责任不仅仅落在富国身上。实际上，鉴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声音，它们将在构建自身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推动成功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将需要所有国家发挥坚定的政治领导作用。

## 经济问题丛书

1. *Growth in East Asia: What We Can and What We Cannot Infer*. Michael Sarel. 1996.
2. *Does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atter for Inflation and Growth?* Atish R. Ghosh, Anne-Marie Gulde, Jonathan D. Ostry, and Holger Wolf. 1996.
3. *Confronting Budget Deficits*. 1996.
4. *Fiscal Reforms That Work*. C. John McDermott and Robert F. Wescott. 1996.
5. *Transformations t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Stephen H. Axilrod. 1996.
6. *Why Worry About Corruption?* Paolo Mauro. 1997.
7. *Sterilizing Capital Inflows*. Jang-Yung Lee. 1997.
8. 《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如此之快? 》, Zulu Hu 和 Mohsin S. Khan, 1997年。
9. *Protecting Bank Deposits*. Gillian G. Garcia. 1997.
10. *Deindustrialization—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1997.
11. *Does Globalization Lower Wages and Export Jobs?* Matthew J. Slaughter and Phillip Swagel. 1997.
12. *Roads to Nowhere: How Corrup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 Hurts Growth*. 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i. 1998.
13. *Fixed or Flexible? G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Right in the 1990s*. Francesco Caramazza and Jahangir Aziz. 1998.
14. *Lessons from Systemic Bank Restructuring*. Claudia Dziobek and Ceyla Pazarbaşıoğlu. 1998.
15.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Guy Debelle, Paul Masson, Miguel Savastano, and Sunil Sharma. 1998.
16. *Should Equity Be a Goal of Economic Policy?* IMF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1998.
17. *Liberalizing Capital Movements: Some Analytical Issues*. Barry Eichengreen, Michael Mussa, Giovanni Dell'Ariccia, Enrica Detragiache,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nd Andrew Tweedie. 1999.
18.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Lessons of the First Decade*. Oleh Havrylyshyn and Donal McGettigan. 1999.
19. *Hedge Fund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nald Mathieson. 1999.

20. 《创造就业：为什么一些国家取得较好的成绩》，Pietro Garibaldi和Paolo Mauro，2000年。
21. 《在波罗的海和独联体国家改善政府治理和反腐败：基金组织的作用》，Thomas Wolf和Emine Gürgen，2000年。
22. 《预测经济危机的挑战》，Andrew Berg和Catherine Pattillo，2000年。
23. 《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哪些因素起作用》，Anupam Basu、Evangelos A. Calamitsis和Dhaneshwar Ghura，2000年。
24. 《完全“美元”化的利与弊》，Andrew Berg和Eduardo Borensztein，2000年。
25. 《控制污染：使用税收和可交易的许可证》，John Norregaard和Valérie Reppelin-Hill，2000年。
26.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对公共政策的影响》，Mahmood Hasan Khan，2001年。
27.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Vito Tanzi和Howell Zee，2001年。
28. 《道德危害：基金组织的融资是否会助长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草率行为？》，Timothy Lane和Steven Phillips，2002年。
29. 《养老金的难题：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先决条件与政策选择》，Nicholas Barr，2002年。
30. 《藏在阴影之中：地下经济的发展》，Friedrich Schneider和Dominik Enste，2002年。
31. 《公司部门重组：政府在危机期间的作用》，Mark R. Stone，2002年。
32. 《金融部门监管当局是否应当独立？》，Marc Quintyn和Michael W. Taylor，2004年。
33. 《贫困国家的儿童教育》，Arye L. Hillman和Eva Jenkner，2004年。
34. 《减债能否促进穷国的经济增长？》，Benedict Clements、Rina Bhattacharya和Toan Quoc Nguyen，2005年。
35. 《金融改革：有哪些促动和决定因素？》，Abdul Abiad和Ashoka Mody，2005年。
36. 《保持金融稳定》，Garry J. Schinasi，2005年。
37. 《将穷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2006年。
38. 《转向灵活的汇率机制：如何操作、何时操作及采用何种速度？》，Rupa Duttagupta、Gilda Fernandez和Cem Karacadag，2006年。
39. 《金融部门监管机构的问责安排》，Eva Hüpkes、Marc Quintyn和Michael W. Taylor，2006年。